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五二期 ——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6c)

【当事者说】	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	马懋如
【史实辨析】	文革时期有没有“四大自由”？	黄学章
【难忘岁月】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姜 莱
【劫后反思】	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郭道晖
【痛定思痛】	“文革”悲剧重演的危险远未消除	李克军
【各抒己见】	文革之死——文革产生的社会结构根源及其不可再生性	许英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

• 马懋如 •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痛。为悼念周总理，清明节首都人民纷纷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总理敬献花圈、诗词，表达哀思，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打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四人帮”粉碎后两年被平反，宣布是“革命行动”。我是天安门事件的一个亲历者，36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刊登了吴忠将军的口述记录《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一文（见本刊zk1206——编者），读后受到了不少启示，也从中知道了当时中央上层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以及吴忠将军对“四人帮”的抵制和苦衷，同时知道了他在天安门事件中所处的地位。

吴忠将军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包围天安门调兵的当事人，是“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被迫上阵）。我是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百万群众中的一个，我曾几次去天安门，

也曾参加了部分清查工作。我耳闻、目睹了很多的人和事，和将军“口述”的不一致。将军是官方、上层，是镇压的一方；我所知来自群众、下层，属被镇压的一方，有差异不足为怪。将军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经毛主席圈阅。但天安门事件过去10年、平反8年后，将军所说与当时群众的感受、与事实并不一致，让人难以理解。下面主要谈我的所知，兼谈和将军“口述”的分歧。

1. 事件的起因

将军说：“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事实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

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不仅太小，也太低，不符合总理丧事的规格，对周总理大不敬，人民很不满。上面下令不准戴白花、不准戴黑纱、不准单位开小型追悼会，人民更加不满。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删去了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目张胆反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不满。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上街贴标语，谴责《文汇报》，并去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各地群众纷纷而起。一列火车路过南京，工人和学生用油漆在车厢上刷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随着列车的运行，消息迅速传向四方，也传到了北京。当时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医科院属卫生部领导，下有三个医院、五个研究所、一个出版社，职工数千人），我们单位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并谴责《文汇报》。“四人帮”将“南京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人民更加义愤！“南京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前奏！

2. 事件的经过，即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

清明节是我国人民祭奠亲人的传统节日，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很正常的事。1976年的清明，是周总理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因而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事实不是吴忠将军所说的去“劝阻”，而是禁止、镇压、打成“反革命”！

3月19日，北京的一群小学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花圈。以后陆续有人去献花圈。

30日凌晨，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的同志到天安门献了两个花圈。军人起来了！“四人帮”恨之入骨，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第一炮”，100多人受到审查。人们称为“革命的第一炮”！镇压由此开始。

当日，北京市总工会的29位工人，把决心同“四人帮”“血战到底”的悼词贴在了纪念碑的下面，表达了首都工人的心声，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打成“第一号反革命事件”，为首的工人被捕入狱，达7个月之久。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

31日晚上，有人数了一下，有102个花圈。随着清明的来临，悼念总理的人越来越多，花圈、诗词也越来越多，再也无法数清了。

我们医科院及所属单位的同志们没有沉默！31日开始有人去送了花圈。4月1日下班后，大家聚在办公室，连夜赶制花圈。党委第一书记杨纯同志托人做了两朵白花，放在群众的花圈上，表一表对周总理的哀思。次日晨，上面下达紧急禁令，院党委推迟传达，我们赶在禁令下达前，抬起花圈奔赴广场。花圈已经很多，最佳位置很难找到。这里已经发生有人受指使夜间

来偷花圈，群众叫他们“偷花鬼”。人们自动组织护花，被称为“护花神”。他们主动来帮助，用他们带来的绳子、铁丝帮我们将花圈固定在纪念碑的栏杆上。眼看许多花圈已被绳子连成了群，以防“偷花”。我们献了花圈，默哀后回到机关。顷刻，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跟“四人帮”很紧）来电话“问罪”，并命令将送去的花圈拿回来。事实并非如吴忠将军所说，“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原来刘湘屏部长派人在天安门广场窥视。大家一致抵制，众口一声：花圈是献给周总理的，谁也不能去拿！我们医科院系统一共送了10个花圈，其中1个花圈上写有一首诗，内容是：“花圈虽小情义深，怀念总理泪浸心。人民继您革命志，防修反修除毒根！”这首诗被刘湘屏宣布是“反革命诗词”，作者受到了重点审查。还有一位技术员在天安门拍了不少照片，被人无意泄露，宿舍被抄，照片被劫，当时本人正出差外地，被骗回京，一下飞机，一副镣铐，被诱捕入狱。事实非将军所说的：“保护群众安全”。

3. 事件的性质，是镇压与反镇压、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

人民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很多花圈上写着“请保留到4月6日”。“四人帮”迫不及待，提前行动。

4月4日，广场上空升起了两束气球，挂着“悼念总理”、“革命到底”的挽联，这是人民发出的最后誓言。深夜，卡车、吊车一二百辆，民兵数千，花圈、诗词被洗劫一空，一些人被抓走。

5日晨，不见了花圈和诗词，不见了人，广场一片凄惨！“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践踏诗文、侵犯人权，人民岂能容！在一片“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愤怒声中，人们烧了镇压群众的指挥小楼和指挥汽车……“四人帮”镇压，当场一些人被捕，被投入监狱。这是一场反镇压、反迫害、争民主、争人权的正义斗争，吴忠将军却说是“一伙人闹事”、“引发”了“冲突”。

4月4日当晚我值夜班，一个家住长安街的同志来电话说，形势紧张，一队队人，手持木棍、手铐正向天安门聚集，一辆黑色小轿车在长安街上转来转去……夜深，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等近十万大军包围了天安门，未及离去的人被抓、遭毒打、罚跪、双手被上背铐，而后投进监狱。一个熟人是民兵，目睹了一切，含泪告诉我们，他不愿当帮凶，装病逃脱。

5日晨，我借故去广场，不敢步行去，乘公交车路过，目睹了劫后的天安门，一片凄惨，没有了人，没有了花和诗，满地是水，残留有片片浅红色的血迹……抬头一望，一个花圈迎着寒风矗立在纪念碑的高处。车上不多的乘客同时向纪念碑行注目礼！返回时，这个花圈不见了。这天又有人送去花圈，上面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公开镇压和内部清查相结合，追查诗词、照片，追查去天安门的人，追动机、追后台。听说，立案追查的有1984件，拘捕388人，被作为罪证撕下的诗词原件583件，收缴的诗词抄件和照片等10万8千多件。

“四五”运动，在江青等左右下，被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同志被定为“总后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追查叶剑英、邓颖超、胡耀邦，等等。医科院是刘湘屏追查的重点。突然传来，住在首都医院（现协和医院，医科院下属单位）的胡耀邦同志，在病房里背着手踱来踱去对人说：不让悼念总理，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嘛！意指耀邦同志鼓动群众去天安门。又传来医科院及所属首都医院，清明节突然挂出了许多幅周总理的遗像。意即与天安门事件相呼应。确实许多办公室、诊室挂着周总理的像。挂周总理的像何罪之有？说明人民大众和周总理的感情之深！果然，刘湘屏派人来明察暗访，大家团结一致应对，未能得逞！

从4月2日起，上面每天要我们汇报去天安门的人数和送花圈的数量，即“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受命办理。医科院下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同志，挺身而出，她对我说，医院的青年送花圈，是她同意和支持的，一切责任由她承担。我汇报的口径（领导默许）是：群众自发，出于对周总理的悼念，不牵涉领导和其他任何人。去天安门的人数只汇报每天上下班和因工作路过的人数。刘湘屏不满，嫌我们报少了。

上面几次下清查令，提出要“追根”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看到了北京市公安局6月1日下发的通知，其中影印有“〇〇一号、〇〇三号……一四三号案件”的11首诗的笔迹，下令要把作者“挖出来”。

在那一片白色恐怖下，保护诗词、照片，留下历史见证，人民和“四人帮”展开了新的战斗。诗词、照片被隐藏起来，埋在了土里，封在了蜡里，转移到香山顶上，送往外地乡村，不少人默默背诵，记在了心里……

1976年10月6日，天安门事件半年后，“四人帮”垮台了。在陈云同志的提议下，1978年11月，“四人帮”粉碎两年后，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北京市公安局释放并宣布被捕的388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只有3人犯有偷盗等罪行）。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而吴忠将军在天安门事件平反8年后的1986年，却强调天安门事件是“极个别”的“攻击毛主席”，“是少数人”“起哄”、“胡闹”，是“一伙人闹事”，这与民众的亲身经历、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结论、与北京市公安局公布的均不一致，这令人费解。

□ 原载《炎黄春秋》2012 / 6

~~~~~

## 【史实辨析】

文革时期有没有“四大自由”？

• 黄学章 •

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所谓的“四大自由”。至今仍被一些文革的辩护者津津乐道，说“四大自由”是毛泽东为了克服中国体制弊端的一次伟大的民主实践。说当时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平民可以反对权贵，甚至打到权贵，是实现了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大民主”。吹嘘得一些没有文革经历的年青人心向神往，羡慕万分。以为，美国人可以骂总统，我们中国也有过可以骂国家主席的时候，真恨不得穿越到40年前去，过一把“四大自由”的瘾。

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毫无疑问，千真万确，文革期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有的。广大民众、红卫兵、造反派，几乎人人享受、参与了“四大”。但是，遗憾的是，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

文革中，任何与上级精神相悖，任何敢于冒犯政权的言论或大字报，或迟或早，都要付出今天不可想象的沉重代价。甚至要搭上自己宝贵的性命！那是一段人类历史上最惨痛、最黑暗的时期。

文革“四大”发源于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教师聂元梓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煽动，随即全国掀起了第一波“四大”的浪潮。这波浪潮立刻遭到各级党组织、工作组的严厉镇压。很快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教师纷纷被打成“右派”、“反动学生”、“反革命”，遭到残酷批斗。文革帷幕刚刚拉开，不少教师、学生就此被逼自杀身亡，成为文革中，品尝“四大自由”的第一批祭品。

仅以清华大学一校为例，开展“四大”才短短十八天，就抓了500名右派学生，自杀3人。党组织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所谓“四大自由”扑灭在血泪之中。

正如毛泽东8月5日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描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当然，毛泽东在这里是把镇压“四大”的责任推给当时处于“第一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既然纠正了刘少奇对于“四大”的压制，那么接下来的“四大”是不是就有了“自由”了呢？

非常不幸，不仅仍然没有“自由”，反而情况更加严酷。几个月后，毛泽东为了收拾残局，向全国大中学校派去了与刘少奇工作组类似的权力机构：如“军管会”、“支左小组”、“军宣队”、“工宣队”……。

在这漫长的收拾残局的数年之中，从来是只有“四大”，没有“自由”。一批又一批的敢于运用“四大”向权力说不，挑战权力的人被打成“反军乱军份子”、“五一六份子”、“阶级异己份子”、“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坏头头”、“打砸抢份子”……，遭到刑讯逼供、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其残酷程度远胜于刘少奇的工作组。一批又一批鲜活的生命被送上了文革的祭坛。

其中，毛泽东亲自部署的长达四年之久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运动，则是对所谓“四大自由”的全面的秋后算账。凡是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红卫兵、造反派、普通民众，均遭到大规模的镇压。

仅江苏一省就有13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南京大学定了1154名“五一六分子”，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有资料披露，全国范围有上千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被关押、被判以重型。

至此，广大民众、红卫兵、造反派才恍然大悟“四大自由”原来是一束美丽的罂粟花。品尝毛泽东赋予的“四大自由”的甘露，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已为时太晚！

毛泽东在号召红卫兵、造反派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时，只是通过官方媒体大力鼓吹。既不给“四大自由”以法律的保障，也不给今后不予追究责任的承诺。

在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对于“四大”，在第四条有这样的表述：“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在第七条中，又斥责了刘少奇的工作组压制“四大”的做法，说“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

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在这个指导性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自由”二字，更无将“四大自由”定位为公民的权力，必须给予保障的表述。就连古代开明帝王一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承诺都没有。反而为所谓“四大自由”预设了重重陷阱。

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公安六条”，就明确规定了限制“四大自由”的以言获罪的政策：“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据此，无数对文革表示怀疑，对毛泽东、林彪做法表示不满的有识之士，惨遭镇压和迫害，不少人像张志新、遇罗克一样惨遭杀害。

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一些文革的辩护者仍然要为所谓“四大自由”狡辩说，即使当时禁止反对最高领袖毛泽东、林彪，但允许反对各级领导，也是件了不起的民主成就。

这种论调也是经不住事实的检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大”的禁区太多了，不能反对的岂止毛泽东、林彪两人？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军宣队、工宣队、以及各省、市，乃至各单位的“红色政权——革委会”……一句话凡是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不能反对的。

但是，谁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呢？并没有个客观标准。实际上也就是各个时期的各级大权在握的人。有权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权力就是“四大”的禁区，谁都不能冒犯，谁冒犯了谁就要遭殃。比如当时山东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江苏革委会主任许世友……曾经都是毛泽东的红人，他们就将成千上万的贴大字报反对他的人，以各种名义打成反革命，关押、摧残制造了无数冤案、假案。

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说，“文革受害者有上亿人”。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轻信所谓“四大自由”，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的无辜青年。

其实，当时“言论自由”并非无法可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年），第八十七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毛泽东如果真是为了解决体制的弊端，要推进社会民主，为何不切切实实地落实宪法，而要别出心裁，另搞一套不伦不类的什么“四大自由”的所谓“大民主”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民主自由阶级论”和“民主自由手段论”的发明者。而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就是毛泽东“民主自由手段论”的精彩杰作。“四大自由”是毛泽东用来打到一大批老革命、当权派、政敌的手段。同时也是横扫一切敢于挑战权威的异见人士的手段。更是扑灭未曾受过“反右”教训的，青年一代心中天生俱在的，人性、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手段。

□ 原载《炎黄春秋论坛》

~~~~~

【难忘岁月】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 姜 莱 •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旁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辙。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歹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

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徙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嘲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

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

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

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2 0 1 1 • 7 • 1 2

□ 原载《共识网》

~~~~~

【劫后反思】

## 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 郭道晖 •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两次提到“决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认为温总理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而已。

### ◇ 文革幽灵还在游荡

文革发生的基本特征，最显著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思维与制度：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包装起来的“以人为敌”（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的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四要素。四者在文革后虽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能无视我们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必须承认并切实清除文革遗产的现实有害影响。

#### 1. 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真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或者真的在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排除异己。

建国以来，他不断在人民内部以及共产党内找敌人，制造敌人。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倒大批“走资派”老干部，最后连他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文革后虽有所抑止，但并未根治。如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产指引下，就进行过诸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反和平演变”等等“对敌斗争”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一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这些都是非法律的模糊语言，可以任意作扩大的解释。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党中央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正确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 2. 关于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

文革的发生虽然有其社会基础和党的领导制度根源，但文革得以全面发动和延续十年之久不能扭转，则是基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早已牢固形成的个人绝对权威，并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这是中国发生文革所特有的条件。文革后，这种条件似已随毛而逝，但其变种则还在流传。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固然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但只是否定了这场“革命运动”，并没有清算“文革思维”，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与“党权高于一切”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相反，决议违反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极力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与他遗留下的政治体制。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要求改变权力过度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体制和家长制特权等封建主义影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过30多年还未予实施。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文革幽灵仍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不时左右我们的政局。

一个突出表现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时出现毛泽东的方阵。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这些动作，恐怕并非真心实意要学前人，而是要树立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威。至于在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如果说，这些活动还只是蒙蔽一些善男信女，为复活对毛迷信造势；那么，各地“第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与制度，则是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体制在党内各级的潜规则和习惯思维的延伸。

文革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个著名的恶法《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反对伟大领袖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属于“恶毒攻击罪”，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不少仁人志士就因此屈死于这一“恶法”。现今有的基层地方党政“一把手”在公民批评检举他们的丑行时，也滥用所谓“诽谤罪”、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抓捕惩处。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小毛泽东”，而小民则疑似犯了文革中的“恶毒攻击罪”。

### 3. 关于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

文革是党的领袖个人发动的一场对全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浩劫，当然只能是踢开宪法和法律、“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地恣意而行。

文革中，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废掉一个依宪法经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文革后也出现超越党章法定程序，在已退位的几位元老的“生活会”上，就可以促成废黜总书记。

文革前，国家的检察机关和律师已取消，文革中，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公安政法部”，公安“老大哥”独断专行，制造各种冤假错案。

现今党的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事实上也仍然凌驾于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之上，或取代了他们的职权。近年出现的一些错杀的冤案，其中有些就是出于上级政法委的强行非法干预所致。如河南“杀人犯”赵作海冤案，本来当地检察机关和法院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几次发回重新侦查，但迫于上级政法委的“指示”，只好硬判“死缓”。11年后，被“杀死”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宣告所谓赵作海杀人是彻头彻尾的冤案，赵作海也被无罪释放。但此前另一个情节类似的“罪犯”则没有赵作海的“幸运”，早已人头落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但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1990年初又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

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站在直面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权益的第一线，本应是一支勇敢战斗、为民服务的力量。长期以来他们位居“老大哥”的强势地位，受人尊敬，这自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由于他们手握强权，不受制约，也易于滥用权力。而各级政法委书记大多是原公安机关的首长。有的政法委领导人公然宣称司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有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成为地方贪官污吏的门丁和打手。重庆原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王立军的胡作非为就是一个恶例。他居然无视公民与媒体对公安等政府机关和人员的监督权，公然号召“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号称“双起”。再如对李庄律师的起诉和强迫犯罪嫌疑人去“检举”替他辩护的律师，在李庄刑满释放之前还企图另加新罪重审，其违反司法伦理、践踏法治的霸道，于此可见。

在民众的法治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有些政法干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无法无天，改而学会了“以法谋私”和“以法反法”的手法，即打着“依法办事”的幌子，其所依之法却是“恶法”，是为本部门本地方谋私的自定规章、红头文件。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其第73条和第83条关于公安机关可以对他们独家认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秘密拘捕，无须通知其家属。这种只便利公安而侵犯人权的法条，就是公安部门的意志体现，它居然获得全国人大以2639票多数通过，被认为是公安部门的“胜利”！（不过也有160票反对，57票弃权。）

### 4. 关于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

无法无天和运动群众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文革运作方式。利用群众运动来“砸烂”宪法和

法制，可“立竿见影”，而策动者可以在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旗号下，幕后操纵，而不承担个人专制和违宪的责任。不加节制的群众运动，也势必越出法制轨道。

文革的特色之一是“人治加群治”，运动治国，即以群众运动的外衣包裹起来的领袖专政，提倡所谓“群众专政”的“大民主”，纵容以群众斗群众、践踏人权。

文革后，虽然执政党宣布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变相的运动则不因某个领导人的意志而终止。其中经常进行的所谓“专项斗争”，就是换个说法的群众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严打”以及以后几次，虽然对维护社会治安不无效果，但由于仍然承袭过去的某些做法，举国动员，大搞运动，常越出法治轨道。运动中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本来应该从轻处罚的却从重处罚了。有的地方还一仍旧制，规定杀人数字，产生一些冤假错案。“严打”还必然伴随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原有制度中的相互制约机制被搁置了。一个案件还没有经法院开庭审理，往往就提前由政法委决定了。

近年这类“专项斗争”，也形成对司法官员的政治压力，扭曲了司法公正。有的地方为了制造声势，又搞起群众大会“公审”，或押解妓女游行。最近河南省的周口项城市还举行“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将被拘押的41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疑犯反绑双手，挂黑牌，押到广场蹲下示众。

重庆的“唱红”也搞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传箴言”为例，据媒体报道，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的区县更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市主要领导人2009年4月28日亲自创作并上传一条“红色短信”，这条“红信”到该年6月初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见华龙网2009年6月3日报道）前些时重庆曾将15000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光碟下发到全市所有学校。还组织千人来北京举行专题“唱红”大会。媒体报道说，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进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了。而这种红色运动的政治动机，无非是企图借恢复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树立当地领导人的权威。

#### ◇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文革重演

上述文革某些元素的遗毒之所以还在一些地方、一些事件中表现出来，基本缘由还在于文革结束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和某些局部的政治改革，但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的根基基本没变。诸如“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第一把手说了算”，权力无制约，司法不独立，政法委擅权，公民无自主的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如温家宝总理所忧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历史条件已大不相同，像极“左”势力所盼望的全面复辟文革，难以如愿；但像重庆这样，特别是某些文革元素的局部乃至大面积复活，则已是可触摸到的现实。

长期以来，人民期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讲得口干舌燥，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难有进展。

正如今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所尖锐指出的：“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有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评论尖锐地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现实昭告我们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民心所向。就连《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且期待一场新革命的受访者居然占到49%以上。（见该报今年3月12日的英文版）面对这个看来使人惊心动魄的数据，不能不使人警悟，如果还依然不为所动，其后果就不是执政者所愿和所能承受得了。

且不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抵制政改；对于有心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我想也不必把政改设想为那么艰险复杂而趑趄不前。无论执政者还是社会精英，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实行多党制，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普选……改革步骤不妨找准切入点和非改不可的急切点，然后平稳推进。以下几点，我认为是当下不难办到、也是迫切要做的：

### 1. 通过“重庆事件”展开对文革的大讨论大反省

应当说，重庆刚刚经历了一场小文革，它已引起全民的热议。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迅速公布“重庆事件”、特别是其“唱红打黑”的真相，由此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反省文革产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检讨其遗留的弊害，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张本。

### 2. 通过纪念82宪法诞生30周年，宣传宪政精神，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落实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这部宪法是初步总结了文革教训的产物，它确认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在以后通过的四个修正案中，进一步确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等重要原则纳入宪法。它是四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其最大缺陷是没有鲜明地明确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严格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还有不少缺漏，宪法权利缺少或没有立法保障。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在治国理念和法治建设目标上，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82宪法颁布2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还要特别强调吸取文革时期破坏宪法的教训：违宪、毁宪就有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危险。

二是要立即落实宪法第35条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的立法。立即制定出版法、社团法、新闻法（《共同纲领》第49条曾确认“保证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以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法律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草案，由于各种不成理有的原因而被搁置。鉴于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进行诉讼，必须有立法为据。在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以前，司法机关不能把宪法司法化，这样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现今只有国务院或其部委制定的有关这些权利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甚至红头文件，如宗教管理条例、出版印刷条例、社团管理条例、互联网的一些规定等。这一则违反了《立法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以法律来制定的规定，是越权立法和越前立法；二则有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的立法主旨是要以保障公民自由为主，而现在的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则以控制和限制自由为主。这也是违反公民权利立法精神的。

### 3. 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

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和官僚腐败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危机催生改

革。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社会动力主要来自备受文革磨难的“走资派”老干部和长期受精神压迫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知识精英，以及被“一大二公”所掠夺、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的农民，那么，今后改革的动力何在？

我认为，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社会的维权力量。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动和促进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其中一些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政治体制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自发地强烈地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

近年来，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散步”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因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更可靠的社会力量还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在形成能与行政权力抗衡的公民社会。现今很多社会事务和政府事务已由自愿组织起来的公民和相关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利来治理。他们对多样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动地自愿地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些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汶川地震时第一个赶到现场施以救援的就是民间社会组织）。它们的崛起还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去年延续至今的广东“乌坎事件”，一方是村民依法理性地抗争，抵制了基层贪腐官员的恶行，索回了部分被非法侵夺的土地，保卫了民主选举的成果；一方是党和政府由打压到理性地与村民平等对话协商，终于化解了矛盾冲突。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官方处理维权事件的重要参照。《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指出：“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可以说是摸到了“乌坎事件”的脉搏。

由此，我们应当从单方面仰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移向关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动力，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最近广东省官方宣布，将逐步从行业协会商会入手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广东省民政厅还表示要放宽社会组织的限制，对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采用登记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改革范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推广的积极举措。

只有这样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



## 【痛定思痛】

### “文革”悲剧重演的危险远未消除

• 李克军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影响还没有消除，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成功，“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笔者认为，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尽管近年来极左势力一直在鼓吹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很少有人响应，从各方面的条件看，“文革”运动全面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文革”发生前就已经出现多年并在“文革”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的某些带有极左色彩的思想、路线和社会治理模式，即郭道晖先生所说的“文革元素”，不但极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而且已经在某些地方高调登台，并博得上下左右一批人的喝彩和支持。最近，极左势力追捧的大人物薄熙来被立案调查，他在位时施行的某些“文革”色彩浓烈的方略和政策迅速退出重庆政坛。这一事件，固然对清除左祸具有重大意义，但其发展态势还不明朗。即使真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成为清除“文革”遗毒，启动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转折点，也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就全局而言，“文革”式悲剧在我国重演的危险远未消除。其根据至少有以下六点：

第一，从理论根基看，导致“文革”悲剧发生的某些错误观点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理和批判，有的仍然在官方话语中时隐时现。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执政党所秉持的政治理论具有超常的地位和作用。当年，党中央组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才顺理成章地结束了十年内乱，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理论上的清左除旧一波三折，没有持续深入开展。在现实条件下，党和国家继续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旗帜固然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必须改变理论研究、解释和宣传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必须对革命导师们的学说进行科学评价和合理扬弃。对某些经历史验证的错误观点或空想色彩过浓的理论应该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明确否定。特别是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观点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宣扬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诸多灾难，不能再继续沿用或在措辞上修补。在一定时期，采取回避或淡化某些理论观点的策略可能有利于思想稳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在重大理论上继续暧昧，则为极左势力攻击改革开放政策，甚至公开为“文革”招魂提供了方便。

第二，从历史回顾看，“文革”罪错不但揭露得很不充分，而且不时被粉饰和美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避免“文革”式悲剧重演，离不开对“文革”十年国家和各界民众所遭受灾难的充分揭露和对历史教训的痛切反思。近年来，这方面的揭露和反思不但没有逐步深化，反而有所退步。涉及“文革”灾难的回忆录和研究资料很少在公开出版物中看到，变相美化这段历史的言论、活动却不断出现。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党史资料对“五七干校”这一“文革”产物给予了明确否定。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黑龙江柳河干校学员战凤翰撰写的纪实专著指出，“干校存续期间，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组织学员进行超负荷体力劳动以外，还进行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很多学员遭到错误批判甚至被隔离审查拘捕关押。”但2010年，原柳河干校所在地建立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五七干校博物馆。尽管馆内《结束语》中使用了“历史教训”、“空想色彩”等批判性用语。但在进入博物馆的公路旁，却矗立着一块醒目的大标语牌，上边写着“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毛主席数次关注的地方”两行大字。馆内简介、前言中，又使用了“再现当年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生活场景，从中挖掘提炼出当年垦荒者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及“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改进机关作风，改造上层建筑的一次实验”之类的评语。走进博物馆大厅，迎面是巨幅水彩画，画面上一队干部高举毛主席画像和五七干校红旗，昂首阔步前进。图画前面是一座汉白玉书本模型，上边印着毛主席在1968年9月30日关于肯

定五七干校和干部下放劳动的批示。在展区中，随处可见“激情年代”、“火热生活”、“看书学习”、“解剖世界观”、“吃小米、爬大山”、“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等通栏标题或口号；多数图片，都反映着“五七战士”激情满怀，笑容满面的神态；毛主席批示、画像等展品的设计和陈放，也在旗帜鲜明地歌颂“五七精神”。解说员在短暂的解说中，说了两次“学员们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从官到民”。1968年以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样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大量史料表明，它对民族文明和一代城市青年的摧残是举世罕见的。但是，在最近几年某些地方政府兴建的纪念馆或组织的活动中，却以“青春无悔”为主基调来否定“伤痕累累”的历史述说。号称“开全国先河”的黑龙江省黑河《知青博物馆》开馆时，省委常委到会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广大知识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了一曲绚丽的华章。”其他参加开馆仪式的省部级官员、知青精英代表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也同样为知青运动大唱赞歌。但在作家邓贤的报告文学和网络上诸多老知青的回忆文章笔下，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幅令人痛心的画面。

由于对“文革”罪错的揭露批判不彻底，某些极左思潮甚至为“文革”翻案的论调呈抬头蔓延趋势。很多40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这一历史灾难知之甚少，对“文革”悲剧重演的警惕和抵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从舆论导向看，“主旋律”宣传活动中往往夹杂着极左思潮的渲染。“主旋律”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尚需认真探讨。即使按照传统的办法，以颂扬执政党的光辉业绩和英雄模范人物为主，也必须尊重历史，在注意防“右”的同时着重防“左”。近年来，某些地方组织的红色旅游活动、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和先进模范人物评选宣传活动，不断出现美化“三面红旗”、宣扬个人迷信，甚至为“文革”招魂的倾向。很多红色旅游景点的解说词中，包括一些神化领袖人物的传说。各地举办的红歌演唱会上，歌颂救世主、变相宣扬封建专制思想的曲目屡屡出现。2011年，笔者到某县出差，观看了一场小型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竟然是“文革”期间的“忠字舞”，“新苦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中升起红太阳”的歌词和臂带袖章的红卫兵形象同时出现在舞台。2011年6月30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竟然将“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牛鬼蛇神一片惊慌”等已经删掉的唱词唱了出来。前文提到的黑河知青博物馆，是经省发改委立项，省文化厅批准设立的。文化厅的文件批复文件很简短，说明设立此馆的目的是“宣传知青感人事迹，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后人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却只字不见“伤痛”、“反思”、“防左”之类的字样。

与极左思潮搅在一起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教育，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在某些的特定时间和空间内，能够激发部分民众爱党爱国和爱岗敬业的热情，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因素，但很难持久并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另一方面，它已经和正在产生两大消极后果：一个是助长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不良倾向，严重损毁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弱化着部分民众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某些带有“文革”色彩的极左理论和施政方略披上华丽的革命外衣以后，受到部分民众的追捧。这充分说明，无论是现代史研究还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都必须与执政党反思极左历史错误，否则，必将贻害国家、贻害民族和执政党自身。

第四，从社会心理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矛盾久久不得缓解，使部分民众产生怀旧心理，期盼着用“文革”式运动的方式改变现状。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结构失衡、分配不公、官场腐化等问题逐渐显现，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杨继绳先生分析说，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这句话，在官僚特权社会，很有号召力。老百姓不管你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只知道“腐败分子”就在党内，而且比1966年严重得多。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响应的人一定不会少。这是“文革”重演的最大危险。

第五，从官员行为看，与“文革”具有渊源关系的运动式领导方式仍然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党政官员的领导方式，变化则非常小。除了以阶级斗争为标签、以整人为内容的政治运动销声匿迹以外，各种带有群众运动色彩的“活动”在各地各领域都屡见不鲜。如：招商引资会战、城乡环境整治会战、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专项治理、严打斗争、万人下乡、几比几看、百日大接访、矛盾大排查，还有举国办xx、举国表态等等。在权力高度集中，层层对上负责的体制下，各级党政官员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领导，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全面控制型的思维和运动式工作方式，使社会管理的创新步履维艰，也经常与“文革元素”同流合污。

第六，从政治体制看，有效避免文革式悲剧重演的民主法治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相当一部分官员缺乏推进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文革”要素的复活，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口号一直在喊，政治生态总体上在不断优化，但步履蹒跚。舆论控制过严、党政关系不顺、宪法和权力机关（人大）地位过低、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等体制性弊端基本没有革除。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出现和目前看到的结局，足以说明，现行的政治体制难以有效防止“文革”式悲剧重演；腐败分子或反民主势力被清除，仍然依赖高层的“英明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多数党政官员，虽然不乏改革共识，但缺乏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和实质性步骤，一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总之，警惕和消除“文革”悲剧重演的危险，铲除极左路线滋生的土壤，应该提到执政党的重要日程。凡有历史责任感的公民，特别是中共党员和各级官员，都应该在思想上自觉清除旧，在行动上主动推进和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 原载《共识网》

~~~~~

【各抒己见】

文革之死——文革产生的社会结构根源及其不可再生性

• 许英杰 •

文革是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孵化出来的一个畸形的蛋，悲剧的种子早在建国之时便已埋下。在那长达十年的灾难中，深度的社会动员以及社会生活的全盘政治化贯穿始终。阶级斗争论作为唯一的文化主题和意识形态，伴随着高度的社会动员，导致了期间恐怖的武斗，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全盘破坏，对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通民众的迫害，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大规模清除。对这场动乱产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的把握这场运动的本质。

◇ 文革产生的要素分析

文革的两大特点——深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生活的全盘政治化——是在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本身需要具备广泛的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组织机构对民众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时需确保不存在其他异质性的组织力量分流民众群体，或者至少不干扰此类组织机构对民众的整合与动员。全盘政治化的社会生活本身需要对社会思想文化领

域进行严密的控制与封锁，进行单一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灌输，使得这一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唯一的社会生活指导理念。

一、对社会的重组——单位制度

1949年之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从1953年开始的三大改造，更是社会改造的全速启动时期，国家几乎全面掌控了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以私人企业为主体，资源自由流动配置，平等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被以国家主导的计划核算经济体制所代替。广泛的国有化与公私合营使得私营企业几近消失，企业、厂矿、商业系统全盘的国有化，使得党的系统深入经济的所有领域，在经济组织中工作的所有人都被纳入了国家掌控的经济体制中。除了城市中的经济组织，国家还控制了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又通过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控制了农村的生产资源，甚至农民的私人生活。由此，所有人都处于国家控制的其中一个组织机构之中。而这些组织运行所需的经济资源都有赖于的国家提供，很显然国家亦成为身处其中的民众所依附的对象。单位成为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归宿。所有的人，只要没有脱离当时的正常社会，都会从属于一个单位，而这个单位很显然都是属于国家掌控的。单位制将所有的民众匡进国家权力划定的范围内，由于一切经济资源的输出都掌控在国家公权力手中，身处国家单位内的民众为了生存，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国家公权力的指令。

单位制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由于所有民众都被匡进单位制中，无数的单位是国家权力伸向社会的触手，亦即权力发生的节点，它把社会分割成无数个网格，并分而治之。单位直接依赖于国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由此国家获得了可支配单位内民众行动的强制力，以单位为起点，国家的触手可调动国土范围内任何一部分的人。

二、原有社会联系的断裂

打破原有的社会联系是社会改造的一部分。就农村社会而言，人民公社制度是打破原有农村社会联系的主要手段。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所有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作，将农民纳入由国家作为唯一股东的基本经济组织中，农民没有迁徙自由，终身在集体中劳作。人民公社制度由在农村中建立的党的分支所领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将国家权力深入到农村田野中，实现了国家对农村的全面控制。国家干部与农民之间联系的建立彻底清除了农村中原有的宗族联系，源之于传统的宗族、宗教、文化权威被国家权威所代替，乡村自治被掐断。

在城市中，公有化改革消除了自由市场中的交易关系，原有的经济联系被国家单位之间的内部核算体制所代替，自由的个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被掐断，由经济关联所加强的脱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社会联系被清除。

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宣扬阶级斗争理论，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通过强力压制西方外来宗教，本地佛、道等行为，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宗教势力的影响，让基于宗教形成的独立的社会联系和动员能力被清除。

文化大革命之后，泛政治化的社会生活下，阶级斗争成为主导一切行为的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分清敌我，表现自身的政治忠诚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活节目，连传统的家庭伦理都被阶级斗争所破坏，产生了父母、夫妻之间因为阶级成分不同，而相互举报的现象。

文革前的社会改造已经清除了所有之前存在于中国的脱离国家体制之外的独立的社会联系。这些社会联系原本能够制造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反对势力。在这些社会联系被切断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分散的态势，而此时单位制的建立重新代替了这些被破坏的社会联系，重新将民

众予以整合，而这次的整合将民众全部匡进了国家权力体系的控制之中。离开了国家施予的权力的联系，整个社会是一盘没有任何联系的马铃薯式的原子化社会。

三、集体主义的滥觞。

建国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对原有的社会联系加以彻底的清除后，新的贯穿了强烈国家意志的新的社会联系——集体主义——被慢慢的建立起来。

集体主义的产生实际上与国家对社会的改造相互契合。独立的社会联系的清除造成了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庞大国家的现实。而单位制的建立实际上重新整合了庞大的原子化的社会群体。所有的个体都成为了国家体制的微小的一员，而集体主义理论的产生重新定义了个体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为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全面控制找寻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集体主义的本质实际上在于抹杀个体本身的价值，认为个体只有融入集体之中进行行动，在集体取得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个体的价值。

集体主义的理念重新定义或者强化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体是作为国家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存在。国家是赋予个体价值的唯一来源，国家的强大，是个体意义的体现。个体的工作、学习要一心一意的围绕着怎么奉献国家与社会来着眼。强调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追求自己定义的生活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作为与集体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个人主义是一种源于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的思想，是严格打击的对象。

集体主义造就了个体对自我价值，对个人自由等的否定，一切向着实现集体的意志而行动。而集体是一个集合，本身没有人格化的意志可以表现，什么决定了集体价值，或者如何判断某一行为有利于集体价值，这种决定权力掌握在国家公权力手中。当权者是集体的代言者，当权者的话语、指令代表了集体的意志，也就是个体应当执行的指南。集体主义并非是协作主义，而只是一种贯彻专制意志的机制。

集体主义配合个人崇拜就形成了令所有独裁者向往的高度的权力集中。个人崇拜之下，克里斯马式的领袖是集体意志乃至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克里斯马式领袖的话语成为被深度动员的民众行动的指南，领袖的除了拥有国家机器所赋予其的强制性权力之外，更拥有了调动社会民众集体行动的巨大能量。文革中所有的暴行都源于集体主义理念的灌输下，个人失去自我思考能力，如预先设定的机器人一般，在集体的裹挟下，为实现既定的集体意志而不折手段。

四、阶级斗争论的全面灌输

建国后，国家权力全面渗透进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取缔私营的文化传媒机构，只允许公立的文化传媒机构的存在，在文化、思想宣传领域建立起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掌控的宣传机构大力宣扬阶级斗争理论，制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对立，并将工人阶级归结为国家体制的维护者，将资本家等改造群体视为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权的敌对者。并且，这一敌对群体很快包括了知识分子群体。宣传机构将原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扩展至维护政权与反对政权两大群体之间的斗争，并延伸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反对集体，提倡个体也可以被称为是阶级敌人。在大力宣扬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之中，制造了反右等对体制内外的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行清洗。随着政治形势的紧张，在宣传机器的大事宣扬中，社会动员程度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理念愈加成为社会的主导行为理念。日常工作，乃至私人生活都贯穿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观念，个体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融进了阶级斗争的过程。

阶级斗争制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站队政治立场，要切实站在工人大众一边，即要服从集体的意志。同时要时刻警惕区分阶级敌人，并与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阶级斗争不分内外，即是家庭内部出现阶级分化也要进行斗争。而作为切实体现自己阶级先进性的表现，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必须体现出先进性，比如要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参加各种批斗大会，要无情揭发周边人的反革命罪行，要表现出自身的阶级觉悟，积极参与严酷的打击阶级敌人的行动。社会生活的全盘政治化，造成了文革中的一系列乱像和暴行。

五、个人崇拜的建立

在单一的文化宣传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体制的全方位，轰炸式的宣传下根深蒂固，毛泽东被塑造成神一样的伟人，毛泽东的话语亦被认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至理真言。毛泽东的话语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由此在集体主义的配合下，毛泽东获取了代表集体意志的权力，具备了动员全体民众，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能力。文革的产生直接由毛泽东发动。毛泽东多次借助强大的单位制之下的动员能力，毛可以调动最基层的民众去实现他自身的政治目标，这种动员能力是集体主义理念在实践中最有力的表现。毛泽东由此获得了无人能及的巨大权力。

以上诸要素的集合造成了文革悲剧的产生。单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原有社会关系的打破重新整合了分散的社会，并将所有民众组合在以单位为组织的架构中，并受到国家权力的强有力的支配。此为文革动员力的基础。集体主义理念与阶级斗争论的长期灌输完成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思想的控制，泛政治化在文革前已经愈演愈烈，政治不断渗透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导致公家权力日益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国家的动员力不断强化。

◇ 当代社会中文革的不可再生性

在当代社会，半自由半管制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大部分社会资源全面向社会放开，原有的基于国家掌控一切社会经济资源而建立的单位制已经瓦解。私营企业，自由的市场交易空间，国家退出了公民的私人生活领域，以及大部分经济领域，民众具有了较大的社会自由。建基于单位制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消失了。在广泛的社会自由下，原有的被清除的社会联系又重新形成，宗族关系、宗教联系、公民独立的团体、自由交易的联系等，社会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组织力量，虽然这种力量还处于比较低的程度。独立的社会联系导致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降低，丧失了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无法像文革时那样，权力伸向社会各个角落的触角能够调动社会中任何一个人投入政治运动。

此外，半开放社会，各种思想交汇，国家无力控制所有的宣传媒体，无法形成如文革时的那种单一的思想体系，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文化潮流和价值理念，随着西方文化、娱乐的传入，寻求自我价值的个人主义不断滋长，集体主义成为了一个虚伪的官方说教被弃之不理。

倘若要再次爆发文革，唯一的可能是中国社会重新倒退回原来的全能型体制，取消市场经济，重建单位制，取缔一切独立文化传媒机构，进行全面的思想控制，而很显然，产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基本为零。

事实上，在重庆事件后，部分知识分子将此事件视为斩断文革再生的重要举措。事实上，对重庆唱红打黑所引发的对文革再次爆发的担忧没有任何意义。重庆的唱红打黑唯一让人联想起文革的地方在于其对红歌这种文革符号的大力提倡，但其本身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造成社会生活全盘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其打黑实际上利用了平民主义的幌子，扩大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因此对重庆模式的文革化担忧时完全没有必要的。

对文革再生的担忧甚至会起着一种副作用。这种担忧容易掩盖当代政治体制本身的不合理性，造成对现行体制合法性的强化，而这是不利于社会本身的进步要求的。

□ 原载《爱思想》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